有感于学生书包的错位

吴伟余

才跨入9月的上海，天气仍显闷热，一早出门的人，稍事走动，就会汗水淋淋，人们期待的“秋意”似乎还羞答答不愿露脸。

因为时值开学季，举凡校区附近的大街小巷，成双成对的家长一面肩挎书包，一面携手自己的孩子；也有祖父母辈的耄耋长者左手提着书包，右手牵着他们的孙儿或外孙的手，朝着学校大门走去。孩子们穿着上身白、下身蓝的校服，襟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或青翠的绿领巾，洋溢着稚气的灿烂笑容，特别夺人眼球。而汽车道上载有学生的一辆辆私家小车，如同下了一路的“馄饨”挨个排着队，缓缓向着学校蠕动，使本已车水马龙的街衢，在接近校门口处，几乎变成停车场。这番“闹忙”的景象，简直可以比同一次“嘉年华”的入场。

跻身在上学的人流，只要抬头一望，作为学生标配的“书包”，外观看去色彩鲜丽，形状很像是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中解放军报务兵身后的发报机，只是少了一根天线而已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本应在学生肩上的“发报机”，多数却出现在陪送学生上学的大人们背上。他们一般到了校门口才依依不舍地将书包“郑重其事”地交还给学生本人，同时不忘弯下腰对孩子殷殷叮嘱一番。此刻，在这些大人的背上，你赫然可见一幅幅规则不一，被汗渍浸润出的“大地图”；更有送学的长者再陪着孩子走上几步的。我猜想，他们是恨不得随孩子一同进校门陪坐一堂，才合他们的心思呢。

面对这蔚为壮观的上学“风景”，尤其你不经意一瞥，常可以见到车已开动，学生也已转身进入校门，但坐在车里的家长还在一次次伸手向着自己孩子背影抛上“飞吻”，每每如此，那随“西风东渐”而来的礼仪，在酷热的9月头上，看起来虽有些清凉，不过，于我心里总有些不舒服，甚或添堵。

回想自己儿时读书的情景，比照今日孩子们上学的“风景”，让人颇感是寒暑两重天。

以往我们从一年级起，都是一式地自己背上书包上学，在校门口都是清一色的学生人流。在“学习做新中国的小主人”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的教育氛围熏陶下，那个时代，哪曾见家长为学生背书包的现象？如果有祖父母辈的长者为学生背书包，陪送上学，不仅会被同学们侧目，甚至会被学生们在背后讥讽是“波尔乔亚式”的人物。

不过话得分两头说，即使是二三十年前，学生的书包不论体积和重量大概至多是现在的一半，一个面宽两本书大小，底宽仅半本书的帆布书包，足以装下一个中小学学生学期内的所有课本。如果小心使用，这样的书包尽可陪伴你整个中小学的生涯。

问题来了，现在学生肩上的“发报机”般的书包，就是刚上学的一年级学生，他们的书包就被各科书本及学习用品塞得满满的，除了语文、数学、英文正课书本，还要外加三种正课的辅导读本，以及各类副课书册、练习本、美术课用品、午餐用具等等，不用说，到了肩上的负荷显然是沉甸甸的了。考虑到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年龄，家长们自然想法子要为孩子们帮上一把。因此，到学校门口你看到的景象，似乎有其一定的内在合理性。

多年来，社会各界都在呼吁为学生减负，教育主管部门也顺应民意，积极出台多项举措。但仅仅从学生们的书包轻重掂量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减负的目标与人们的期许还有距离。由此，我们不用再论及学生用于家庭课业的时间，是如何剥夺了学生本该享有的课余玩耍的欢乐时光，以及他们为此所呈现的种种无奈和窘迫的状况，仅以学生身上的一个书包为例，即可为全社会扼腕叹息了。

行笔至此，我眼前浮现了晨间孩子们上学的“风景”，大人们肩挎书包汗流浃背，孩子们衣着光鲜，一脸的天真烂漫，校门口的“嘉年华”场景迭出。这样的一幅画面本应令人动情，但我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，总觉得画面中学生的书包不仅错位，且格外沉重，大有快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之感。如此，我的心底好像隐隐传来“请将书包回归在学生的双肩，让学生承接应有的担当！”的呼声。那声音渐渐地愈益响亮……

边看边聊

小小木雕，大大身世

萧岩

木雕艺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而黄杨木雕以其紧密、坚韧的木纹成为理想的雕刻材料。黄杨木雕实物可考最早出现在清代，到近代逐渐形成各种流派，其中，上海的海派黄杨木雕就以其中西融合而别具一格。

海派黄杨木雕的创始人叫徐宝庆。上世纪40年代，徐汇区土山湾地区曾有外国人开办的孤儿工艺院，许多国家的专职老师教授多种艺术技能，其中就包括雕刻技艺。在那里，徐宝庆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素描、雕刻、绘画及文化艺术等知识，师从西班牙雕刻大师那勃斯嘎斯和日本的著名雕刻大师田中德，同时又向浙江木雕师傅学习中国传统的木雕技巧。如此这般中西汇通，遂成一派：他在西方雕刻手法上，融合中国传统雕刻艺术手法，形成了圆润明快的雕刻风格；题材上，则走出西方宗教人物故事等主题，而着重表现生活场景、文化内涵、传统信息和浓厚的民族元素，为木雕作品赋予了更多灵动与韵味。

且看这座代表作《撑骆驼》：神态生动，气韵流转，笔法明朗；捕捉的是极速的系列动作中停滞的一刹那，动中取静，静中又分明接通了前后的无限之动，着实令人赞叹！

多年来，徐门弟子继承发展了海派黄杨木雕的艺术风格。惜乎，近几十年，纯手工、慢制作的精细理念与市场化制作的成批化、机械化与模式化要求发生冲突，这门绝技，也仿佛雕像一样，停滞在了一时。这有着大大历史的小小身姿，能否再次活动起来，再次如孩子的笑脸般青春四溢呢？

非遗在身边 美术篇

七夕会

三十年后再住院

戴存亮

三十年前，上海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疾病漫延，成千上万人感染甲型肝炎。一时间，医院里人满为患。在这场灾难中，我亦不幸中招，住进了医院。

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治疗。病房位于医院一角的一幢小楼内，十几平方米的屋内，横七竖八放置着4张病床，病房里没有卫生间，逼仄且不适。正值隆冬季节，半夜里内急了，要去室外的公共厕所，北风呼啸，浑身直打哆嗦，叫苦连连。住院期间，每天打针服药，一日三餐，枯燥又乏味，一个多月后终得病愈回家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我又患病住院了，距离上次住院过去了三十年。三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住院的经历和感受亦有了许多变化。

这次所住的病房宽敞明亮，丝毫不觉得拥挤。房间内都有独立卫生间，供应热水，对于像我每天要洗澡的人来说，是天大的利好。上次住院时，每张病床架子上都挂着一张卡片，上面记录着病人的个人基本信息，还记录着病情，无论患者本人、家属以及他人都一目了然。如今，床架上挂着的卡片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床头上方的电子显示屏，显示屏除了显示姓名、床号，就是护理等级、饮食方式、过敏类型，没有病情披露，这无疑也是一种文明与进步。

住院治疗，注射输液是司空见惯的治疗方式。上次住院时，注射时输液瓶都是挂在一只铁架子上，躺在床上输液时，铁架子要随着左右手轮换而不时地移动。如果要上卫生间，只能将挂着瓶子的铁架子随身带进卫生间，既沉重又麻烦。现在病房里已经不见铁架子踪影，每间病房屋顶天花板上都安装滑轮导轨，装有可上下伸缩的挂钩，还能纵横滑行，输液瓶只要一挂上去，就能自如地移动，十分方便。以前注射一次，就要扎一次针，现在有了埋针技术，埋一次针，可以管三四天，用不着每次注射都扎针。这次住院我每天要注射三次，要是在以前皮肉不知要吃多少苦呢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病人刚住院，就会领到一只手环，手环上印有病人姓名、性别、住院编号、条形码等。手环记录着患者入院全部信息，无论护士前来注射发药，还是病人做各种检查，只要用识别器对准条形码扫一扫，医患之间的信息就全部记录在案，减少了许多环节，办理出院手续，了解费用支出情况，手环都能帮助到你，方便又准确。一只小小的手环体现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，这在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。

对照三十年前后住院体验，说了许多“变化”，接下来说说“不变”，最大的不变是白衣天使们的仁心仁术。当年甲肝流行，来势汹汹，面对传染性很强的疾病，医护人员临危不惧，不辞辛劳，夜以继日奋战在第一线，拯救了无数像我一样的患者。这次住院，我再次体会到白衣天使们的精湛医术与奉献精神。无论是每天早晨护士们的第一声问候，还是主任查房时的认真倾听和仔细诊断，都给了病人暖暖的慰藉。护士台墙上挂满了患者赠送的表彰的锦旗。

说到“不变”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，就是一成不变的难以下咽的饭菜。据说以前总是让人诟病的高铁伙食如今有了改善，能否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呢？

健康

兄弟永怡

陈连官

行走于新场的洪东街，走进64号的胡氏老宅，便会见到仪门上的“兄弟永怡、居仁由义”的两幅砖雕题额。

胡氏老宅的主人叫胡桂清，老宅建于1931年。前后二进，宅第雕刻精细，格局完整，沿街面为两层带腰檐，六扇原色木板大门高大，内有仪门，上书“兄弟永怡”。意为“永”字辈、“怡”字辈世代相好如兄弟般互帮互助。

胡氏老宅由胡桂清弟兄两个共同建造，他们的先辈来自哪里已无从查考。兄弟俩出生于新场镇东南，从小家境贫寒。长兄胡桂清一字不识，自小就跟随父亲学手工编制竹器并在镇上摆摊经营。

在胡桂清十三岁时，母亲去世，十九岁时父亲也追随母亲而逝。长兄为父，胡桂清便独自承担起了这个家庭的责任，并将弟弟胡桂卿送进了当地的一所私塾读书。

最初创业的艰难自不必说，胡桂清总是吃苦在先，负责到江苏、浙江等地的山上采购毛竹等原材料，风餐露宿，历尽千辛万苦。弟弟胡桂卿在家忙里忙外掌管经营和销售。兄弟两个同心同德，一起努力，创办了新场镇上有名的“胡义盛竹木行”，盖起了这座胡氏大宅院。宅院落成之时，请镇上的乡绅在仪门上题写了“兄弟永怡、居仁由义”八个大字。

此后的岁月里，胡家兄弟共同居住在此。儿子辈的名字都带有“永”字；孙辈的名字都带有“怡”字。

仪门上的八个大字其意深远，“兄弟永怡”的“怡”字，是和气、愉快的意思，兄弟在一起要做到和和气气、快快乐乐；“居仁由义”的“仁”字，是同情，友爱，互助之意。“由”是自上而下的意思；“义”字，就是讲情义。“居仁由义”就是指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要互相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，一家人不管大小都要重情重义，和睦相处。

75岁的胡桂清儿子胡永安在《新场梦华录》一书中这样口述：“我父亲一辈子吃苦耐劳，从不摆阔气，平和待人，勤俭持家，兄弟和睦，以88岁高龄走过了他创业的一生。”

胡氏仪门上的题匾从此成为胡氏家族的传世家训。仰望八个大字，虽经岁月风雨的洗刷，依然昭示着人性的温暖，如门前的洪福港静水流深。

一块宝石花手表

紫荊

我戴的第一块手表，是在农村劳动一年后，用年终分红和队长特意留给我的手表票所购买，那是一块熠熠生辉、光彩照人的上海名牌宝石花女表，17钻防水防震、小巧玲珑的表型契合我纤细的手腕。

四十年前，我下乡到远郊农村，队长见我柔弱瘦小的模样干不了重活，便把我带到猪舍前安排我养猪。队长告诉我：“里面有三头猪，把它们养肥了年底卖给供销站，可增加些分配资金。”队长还承诺：如你养好了这三头猪，卖了个好价钱，会给你留一张手表票。要知道，在当时手表是紧俏商品需凭票购买。听了队长最后一句话，我心中一阵欢喜，盘算着年底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一块手表，便爽快地接受了队长的安排。

我看着三头干瘦的猪，心想：如要养肥它们，光靠水葫芦、菜皮喂养是不行的，得补充米糠、麸皮等精饲料增加蛋白质，但在那个衣食困乏的年代，人们果腹尚且粮食不足，还会有多少米糠、麸皮剩下喂猪？我思来想去一筹莫展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在猪舍里切菜皮准备喂猪，忽然听见外面有卖豆腐的吆喝声，顿时，灵光一闪：这黄豆磨成了豆腐，剩下的渣不是可以用来喂猪么？但到哪儿去弄豆渣呢？这时，我想起了有一位同学毕业分配进了镇上的豆制品加工场，立即联系了她。不问不知道，一问才显得自己孤陋寡闻，原来，她们加工场里的豆渣早有养猪户捷足先登，如我要，需与那养猪户协商并在开早市前取走，因为湿漉漉的豆渣堆放在工场间会影响早市的售卖。后来经协商，我与那养猪户达成了协议：轮换取豆渣。每逢我取的日子，天还未放亮我便要起床，拖着生产队那辆笨重的劳动车，来回走近三公里的路到镇上的豆制品加工场拉豆渣，无论刮风下雨道路泥泞一路颠簸，必须咬牙坚持，因为那三头猪的肚子不能空。

年底，队长派人用拖拉机把二头肥猪连同一窝猪崽卖了，不仅卖到了好价钱，还得了不少肉票和饲料票的奖励。队长也没忘记承诺，给了我那张手表票，年终分红后，我揣钱凭票购买了一块宝石花牌女表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市场早已丰盈繁荣，手表也不再是稀罕之物，我换过的手表大多已淡忘了，唯有第一块宝石花手表能让我记忆犹新。

“龟女”抗婚记

郑自华

前不久，大学同学聚会，王兄说了一段“龟女抗婚记”，令众人捧腹。

王兄的中学微信群里，前几日吴同学发信息，说家里的一只乌龟死了，有点伤心，如今两个雄性乌龟只剩一个，未免孤单。有好事者说，既然如此，“男大当婚”，也该成个家了。王兄介绍说，家里正有两只雌龟，于是，群里一片起哄，“攀个亲”，“结个秦晋之好”，吴同学特别声明自己家境不错，“龟女”上门一定会善待，好生侍候。王同学想，“龟女”大了总要嫁人，嫁个金龟婿也不错啊，总不见得做一辈子的“老龟女”吧！于是吴同学说明天过来迎娶“龟女”，王兄说哪有那么简单，须备好花轿。群里同学一阵欢呼，都说要见证这段亲上加亲的历史时刻，迎亲酒是必须的。约定第二天中午办喜酒。

想到第二天“龟女”要当新娘，见公婆，见“龟婿”，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见证，总要梳妆打扮吧，好歹也是“王府”出来的。王兄养了“龟女”20多年，正值青春年华，“王府”家教甚严，“龟女”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从来不接触异性，明天算是第一次出门。王兄的“龟女”体态匀称，直径20厘米，宽度15厘米，体重3斤左右，标准的美女身材。一番梳洗后，王兄还特地将“龟女”放入新房——塑料筐里（这是给“龟女”的陪嫁），见筐有点湿，拿张报纸擦干净，谁知那“龟女”张口就咬住了王兄的手指，血立马出来了，一块皮也咬下了，赶紧消毒包扎。现在轮到我们大学同学大笑，袁兄说：“晓得你要让她‘出送’了，当然要咬一口。”田兄说：“这是给娘家人的永恒纪念。”我说：“你未经‘龟女’同意，自作主张，包办婚姻，自然心里不爽。”第二天双方亲家在酒店见面，结果来了九个同学，亲家见王兄伤口包着，忙问怎么回事，王兄说：“被你媳妇咬的！”如此这般，王兄将情况说了一下，众人哄堂大笑。王兄恨恨说道：“这‘龟女’养了二十多年，不念养育之恩，还咬我一口，真是龟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。古人云，‘龟女’大了不中留，一点不错。”罢罢罢，迎亲酒也摆好了，总不能赖婚吧。酒后，“龟女”被亲家带回去了。

“龟女”嫁出去了，王兄心里总有点空落落的，于是电话问问情况吧，小夫妻俩恩爱吗？亲家说：“你家‘龟女’太顽皮，不肯同房也就算了，还经常逃出‘闺房’，让我们一顿好找。”我等一干同学听后对王兄说：“看来你家‘龟女’蛮有个性的，从抗婚到逃婚，不知这脾气像谁？”